

視點與溝通： 中國傳媒研究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對話

李金銓

《摘要》

華人傳播研究社群不應該再跟著美國主流的研究亦步亦趨，而應該站在自己的文化脈絡裡面建立獨特的理論視野，兼顧技術問題和宏大敘述，融合社會規律和意義；既照顧文化的特殊性，又彰顯理論的普遍性；最後以平等地位和西方主流學術對話與溝通。為此，我們必須入乎霸權，出乎霸權，融會貫通，進而提出符合本身文化脈絡的詮釋。

關鍵詞：華人傳播、西方學術主流、美國傳播研究、溝通對話、霸權、跨文化、區域研究、文化中國、實證主義、韋伯

應邀作客於溫伯敦，主人英國倫敦大學著名的傳播學者科倫（James Curran）是多年好友，酒酣熱了耳根，不拘禮隨便聊起來。他突然問我：「你在美國中西部教國際傳播這麼久了，滋味如何？」我寄居北國二十多個年頭，比蘇武牧羊還長。我回覆說，美國學生始終不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國際的一部分，而是國際的對立面；「國際」學生是「外國」學生，「國際」傳播就是「外國」傳播。所謂傳播學當然就是美國傳播學，不必標明「美國」，因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識」。講起新聞傳播，只有美國有資格給世界提供標準答案，豈容他人噙噙置喙？初識者總認定我靠中國文學或歷史吃飯，一旦發現我沒有那麼多學問，只配勉強在他們最自豪的新聞傳播學院蹲點，那個吃驚又尷尬的表情堪以入鏡。他們隨後知道我教的只是化外的「國際」傳播，頓然好像釋懷一點。今天在北美洲，我敢說沒有哪間新聞傳播學院不把「國際傳播」當成點綴品的——聊備一格，聊勝於無，可有可無，這就是美國高唱「全球化」聲中的一幅諷刺畫。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經過電視轉播，每每風靡半個地球的球迷，只有美國人老神在在，無動於衷。美國人唯我獨尊，他們玩的那套美式足球決賽叫做「超級杯」（Super Bowl），棒球決賽乾脆直呼為「世界盃」（World Series），世界是美國，美國就是世界。我參加的學會美其名為「國際傳播學會」，每四年在外國挑個希爾頓之類的五星級飯店開一次年會，不就是以美國學者為主、在國外例行熱鬧一番的世界盃儀式！

美國的民主制度穩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鮮事。學者們關注的無非是體制內的一些技術問題，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國的生活方式，難怪選舉（美式民主）和消費（資本主義）的研究鋪天蓋地，有的見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節、瑣碎無聊的。華人學術圈一時恐怕無暇專注於這些細微的問題，至少得擺一大部分精力在媒介與第三世界革命、專制與民主這些翻天覆地「體制變化」的宏大敘述。他們的問題也許「不完全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幾乎「完全不是」他們的問題。我們侷促在全球學術市場的邊緣，既不願意隨著他們的音樂指揮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們平等對話，如何是好？

一、多元的視野，多重的解釋

知識生產不是價值中立的。證據是最後的審判者，但證據靠人識別和解釋。知識生產者總是受到興趣、背景、師承、學派、政經條件——別忘了還有更大的時代

氣氛——層層制約。現象學家稱這些因素為「相關結構」(relevance structure)。嚴格訓練使人言之有據，反覆省思讓人明白偏見之所由，縱然如此，沒有人能夠完全擺脫知識的盲點。克服盲點的第一步，就是正視這些盲點。

我們得承認美國是世界體系的核心。美國學者看中國，好比站在廬山之外看廬山，不必揜傳統華裔學者的心理和文化負擔，的確出現不少觀察敏銳、分析透徹的佳作，旁觀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們這個知識系統有獨特的偏見和盲點：一般英美學術界和新聞界從來想當然耳，按照自己的現實需要和腦中的偏見，描繪出以偏概全、自以為是的圖像。他們建構的當代中國，有太多東西隨著國際冷戰的大氣候和美國國內的小氣候流轉，反覆顛倒而多變，對中國的認知總是徘徊於浪漫情懷與懷疑抹煞之間，搖搖擺擺，竟不到持平點。

尤其是文革時期，許多美國學者和記者蔽於「天真的革命浪漫幻想症」，看到叢林的尖端，便當作天邊一片雲；抓住一些有限而可疑的材料，居然就拚命建造封閉的理論空中樓閣，根本經不起起碼事實的驗證，難怪風一吹就塌得片瓦不留。那個歲月正逢美國反戰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種族運動的高潮，毛澤東高呼甚麼「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那些口號全給美國激進分子聽進去了，他們對國內社會怨懟的情緒一股腦兒投射到中國的文革，找到宣洩口，建構一幅浪漫而虛脫的想像。毛澤東的死亡象徵這種想像的破產，學術和媒介論述一時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媒介又把中國改革的勢頭解釋為「資本主義的勝利」，結果給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頭棒喝，緊跟著再度陷入九〇年代的悲觀與否定(Lee, 1990)。美國媒介塑造中國的形象，不僅反映中國的現實，也反映美國的現實，更反映中美關係的起伏。

我們要求在「互為主觀」(intersubjective)的基礎上，建構多元(plural)而多重(multiple)的詮釋。多元而不單一，不被權力壟斷，不定於一尊。多重解釋曲盡其致，欣賞「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觀，避免簡單粗糙的理解。是非本無實相，「互為主觀」把問題適當的相對化，容許大家在寬容的詮釋環境裏尋找定位，並保持不斷的民主對話。華人傳播學術圈應該趕緊建立相輔、相成、相爭的詮釋社區(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對話」要有「對手」，不能喃喃獨語。除非我們入乎西方學術霸權的核心，然後出乎其外，否則勢將沒有資格爭鳴或對話。從知識論來看，「局內人」靠經驗與觀察求知，「局外人」以反省與詮釋見長，各有千秋，各具盲點。華裔學者看華人社會，更能解讀微言大義，更能掌握各種網絡關節，但這

不是必然的，不是與生俱來的。我們自己有許多文化包袱和思想弱點要甩掉，卻又偏偏習焉不察。所以，唯有裡裡外外虛心交流，放棄霸權形態，才可能截長補短。

二、所謂的「跨文化」：技術問題與宏大敘述

七〇年代初抵美國，我在新興的傳播學門外張望，無意間接觸到一本《創新傳佈》，當即驚為「奇書」。作者羅吉斯教授（Rogers, 1962）年方四十，已紅遍半邊天。他地毯式搜集兩千篇相關實證研究，一半以上是在第三世界做的，然後整理出框框條條的理論假設，逐一歸納統計每個假設獲得百分之幾「跨文化」研究的證實。我頓時像觸了電，深為其科學客觀、條理分明所折服，何況他文字簡明，的確讓初學者有豁然貫通的錯覺。我不僅心嚮往之，甚至從學於他兩年。後來隨別的因緣轉益多師，遂懷疑羅吉斯援引那些貌似客觀的「跨文化」研究，本質上莫非把深植於美國文化土壤的理論挪到國外去「再生產」，把理論背後的假設「全球化」和「自然化」，變的只是一堆代表某些現象的數字。

中國大陸的學者喜歡講「語境」，台灣學者稱之為「脈絡」，講得好。這個語境畢竟是受制於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的。一個時空背景下的學術偏流，可能躍居另一個時空背景下的主流，孰主孰客，要看社會怎麼建構它，真的沒有必然或絕對。此外，在不同的語境下，相同的概念可能產生特殊的意義，建立不同的因果關係。有人潛意識裡覺得，外國學者提供普遍理論，中國學者只能證明那個理論在特殊環境的真偽。果其然，我們搜集材料豈不只為給西方理論當註腳？我們學術成績薄弱，長期缺乏自信與自覺，接受強勢學術圈所界定的現實而不自知。

談到羅吉斯，南京大學石琳同學送來電郵說，她讀罷羅氏的《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一時間深為其脈絡清晰、語言淺白生動所吸引，但讀了我對羅吉斯的描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我說，那本書的確娓娓道說一些動人的故事，可惜淺出而不深入，對於傳播學與時代背景的聯繫，對於社會科學的動態發展都講得太簡略了。書寫得通俗化而不簡單化，清楚明白而寓意豐富，見樹又見林，談何容易？說起這類書，我以為勃格（Berger, 1973）的《與社會學有約》實在無出其右者。

她又說：「同時精於技術問題與宏大敘述的學者總是有限。其實不管精於哪一邊，都是深刻的片面。我們需要一個成熟的學術環境，讓精於宏大敘述與技術問題的兩類學者相互啓迪、鞭策、印證」。

我無意把技術問題和宏大敘述黑白二分。宏大敘述必須以技術和證據為基礎、為襯托，技術問題最好有宏大敘述的關懷，它們彼此層層滲透，應該有辯證的聯繫。我一向尊敬那些把技術問題處理得乾淨俐落的學者。任何人學好學精一套工具和方法，不憚其煩，費時費力，絕不簡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許多問題只能靠某些技術工具來解決。只是「利其器」以後，怎麼「善其事」？技術問題的背後是甚麼？技術不應該只為技術而存在，成爲一種學苑內的嬉戲。反之，宏大的敘述不是放言空論，如果沒有堅實的證據和嚴謹的理路，說得再天花亂墜，還是口水多過茶，等而下之則是意識形態，不是學術研究。社會科學畢竟是實證科學，受哲學的影響，但不是哲學。儘管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間卻不能畫上等號。

我服膺米爾斯（Mills, 1959）的爲學態度，他認爲社會學者必須念茲在茲，結合個人的興趣和重大的社會議題，而且置社會問題於歷史爲經、世界爲緯的座標上。這個說法對「做怎樣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甚有啓示：從個人最深刻的經驗向外推，思考擴及普遍的社會現象，最後竟聯繫到一些根本的關懷，以至於發展成一種學術志業，那麼學術工作就構成一個整體，不是割裂。基本關懷（例如自由、平等）必是每個社會永遠存在而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需要因時因地從各領域注入新的內容和詮釋。社會科學屬於公共領域的自由獨立論述，一旦疏離於社會實踐，則滋長知識的專橫。社會科學工作者參與公共論壇有兩個角色，一是公民，二是專家；他們應該從專業視角，對公是公非有所擔當，維護普世價值，但不能像傳統儒家士大夫享有泛道德的特殊地位。

鑒於當今中國眾聲喧囂的語境，我得趕緊澄清可能的誤會：我反對「假、大、空」。在華人傳播學術社群裡，許多人論多證少，有人甚至只論不證。他們沒有傳統樸學或西方經驗「技術」的嚴格訓練，但憑直感和空話鋪成一篇篇「應該」（should）如何如何的論文，獨獨說不出「是」（is）甚麼。然而未知「是」，焉知「應該」？他們只敢大膽假設，不肯小心求證。他們不但缺乏看問題的理論架構，也很少落實到「技術」的層面——包括建立嚴謹平實的論據，關照搜集證據、證明假設等一連串明辨的過程。「技術」不及格的人，且莫大言炎炎。環視當今華人社會的語境：大陸最欠缺樸實的技術訓練，太多聰明人盡講些華而不實的套話和空話，太少人願意踏實深入分析點滴的材料；港台學者多半經過美國（少數爲英國）的學術洗禮，參考架構容易流於美國式的瑣碎化和技術化，如不及時提升到對一些

終極關懷的境界，恐怕只能勤於給西方理論當註腳；在美華裔學者爲了讓主流思想和權力結構接受，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批判的本能，但求附麗或同化其間。美國社會和學術市場多元而未必開放，趨同（conformity）的壓力極大，這一點早已爲撰寫《美國民主》的托克威爾（A. Tocqueville）道破，所以長期在美國教書的人的確需要一點膽識和瀟灑，願意學貓頭鷹站在邊緣位置冷眼旁觀，與主流若即若離，獨來獨往。

法蘭克福學派諸子避二戰於美國時，與美國重實證主義的文化土壤格格不入。阿多諾（Theodor Adorno）最早寄居哥倫比亞大學，拉查斯斐爾特（Paul Lazarsfeld）邀請他合作，希望用量化的方法「驗證」法蘭克福的社會理論，卒因想法實在南轅北轍不得不分手。法蘭克福諸子後來陸續學習一些實證方法，阿多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發展出一個量表，測量法西斯的「權威人格」。戰後他們當中多數回到德國，在面對論敵時，反而站出來爲實證方法（而不是實證主義）辯護。他們用實證的技術闡發宏大的敘述。我贊成實證，但反對實證主義。以前老師總教學生寧可小題大作，不要大題小作，以免空疏無當。但若把大題目分成許多小題目，緊密聯繫，每個小題目都做得紮紮實實，證據確鑿，論理清澄透徹，大題仍然可以大作，技術問題與宏大敘述無妨相輔相成。

三、文化中國的中心與邊緣

八〇年代期間，海外知識界提倡「文化中國」，以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的闡述最明白透徹。「文化中國」的提法當然是相對於「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剝到最後一層也許糾纏不清，界限難分。特別標出「文化中國」，無非希望賦文化領域以較大的自主性，不讓政治經濟勢力獨吞公共領域，以致把文化邊緣化爲一個「剩餘範疇」。經濟在商言商，利之所在，無堅不克；政治利益的短暫考慮夾著太多權謀恩怨，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害。唯有文化源遠流長，視野比較高亢，可以冷靜看問題。文化瞭解有助於打開政治僵局，但文化的意義在我看來是超越政治，相對獨立於政治而存在。

杜維明（Tu, 1991）把「文化中國」分成三個圈圈的象徵世界：第一圈包括中港台和新加坡的華人社會；第二圈包括北美和東南亞的少數華人社區；第三圈則無關乎血統，凡在知識上促進對中國的瞭解，不管是學者、專家、記者、商人和實業

家，都算是「文化中國」的成員。他說，對於當代文化中國的瞭解，這幾十年來貢獻最大的不是來自於核心的第一圈，而是來自最邊緣、最鬆散的第三圈，這就頗有後現代「中心即邊緣，邊緣即中心」的味道了。

最內圈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專制政權分頭把文化政治化，文化自主的空間幾被擠壓得蕩然無存，在「口號治學」的歪風下，許多研究當代的「學術文化」轉變成意識形態和宣傳叫囂。三不管地帶的香港，經濟大，文化小，雖是整個「文化中國」的運轉站，但它的文化淺盤貢獻不大。

「文化中國」的第三圈，說穿了，最主要的基地還是在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和所有的區域研究都具有強烈的實用目的，一一被編織於冷戰所需要的知識系統裏。這是美國學者觀察世界的基本「文法」，但千萬別一竿子打倒學術，貶之為維護美國帝國利益的工具。對我們來說，最難解的吊詭是甚麼？一方面，我們理解的當代文化中國，多拜賜甚至依賴於美國學術文化界的成果，否則眾瞎所摸到的中國巨象一定更殘缺；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卻普遍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彷彿別的國家存在只襯托它的偉大，中國研究附麗其中，注定是一支邊緣的偏流，短期內（甚至長期內）很難進入主流的殿堂。中國研究倚重在「文化中國」圈最邊緣的美國，而它本身又在美國學術文化圈的邊緣，面臨一種「雙重邊緣」（邊緣中的邊緣）的尷尬。

除了中國研究的困境，美國主流傳播本身也有學科發展的問題。傳播學界把中國（或「國際」）畫出雷達的範圍，姑且不論；一般傳媒研究又像放大鏡照肚臍眼，理論關懷的地平線太窄太低，自外於社會實踐，幾乎放棄公共辯論的話語權。坦白說，走出本行還有影響力的傳播學者寥寥無幾。假如華人傳播學術圈照搬美國這套主流的東西回去自己的文化脈絡，不加思索改造，只顧一逕奮勇再生產，那麼注定要淪入「邊緣的邊緣的邊緣」的命運，對於目前驚天動地的社會變革，如果不是無動於衷，也只能默然旁觀。

四、美國傳播研究逐漸向內看

美國崛起於二十世紀，取代了英法帝國主義而稱霸世界，美國佬因此以為地球只繞著他們轉。美國打個噴嚏，全世界都得傷風。美國人文化孤立主義的心理情結一脈相承，唯其政經勢力獨尊，一般人覺得天下之大之美盡在於斯，沒有了解異文化的迫切感。跟中西部和南部那些充滿奶油味的純樸農民說幾句話，你立刻明白東

京、南京、北京對他們都一樣遙遠而模糊。奈何當今社會科學的思潮唯美國馬首是瞻，我們無法忽視它的巨大存在。十幾年前，我在美國校園碰到幾位德國來的交換教授，向他們探詢法蘭克福學派的動態，不料他們迅速轉開話題。後來才恍然大悟，他們根本不懂法蘭克福學派——二戰以後，德國媒介研究沒有繼承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術資源，反而跟隨美國的實證主義亦步亦趨，早就把「德意志意識形態」一筆畫出界外了。

三〇、四〇年代期間，芝加哥大學開山的社會學家們開闢了一些原創的媒介研究，以杜威的實踐主義（pragmatism，或譯實用主義）為世界觀，他們把媒介當作社會有機體的制度，聯繫都市化、工業化和大量移民引發的迫切問題，例如派克（Park, 1922）研究各移民報紙如何促進民族大熔爐，處處表現了淋漓的社會改革精神。二戰以後，美國的勢力如日當中，媒介社會學的重心東移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拉查斯斐爾特（Paul Lazarsfeld）發展的大型調查研究，受墨頓（Robert K. Merton）的中距離理論（middle range）和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引導，取代芝加哥學派，躍居主流，基本精神從批判改革變為給美國持盈保泰。結構功能論的政治傾向保守，但無妨哥大氣象恢宏的第一代大師，以及他們優秀的弟子們，分領美國社會學界風騷達數十年。

後來整個美國社會科學過份追求專業化，忽略通觀通識，學術的崇山峻嶺紛紛變成了丘陵起伏，隔行如隔山，甚至連同行也壁壘分明，紛紛為技術化和窄化推波助瀾。最糟糕的，實務傳統的「新聞系」開始引進的「傳播」課程以後，學殖淺，拾人牙慧，一頭走入「天真的經驗主義」（naive empiricism）削足適履的胡同，凡是跳出它狹窄範圍的都不是問題。窄化到這個田地還不能自拔，社會批判的刀鋒磨蝕殆盡，研究旨趣和社會脈絡脫節，簡直坐井觀天，最多枝枝節節地給權力機制（政府和商家）提供合理化的解釋（Hardt, 1992; Carey, 1992）。直到六〇年代末，激進的社會抗議風起雲湧，少數學者正面挑戰保守的結構功能論，回頭去芝加哥學派找靈感（但此時芝加哥的旨趣已經遠離媒介），並期望借這座橋吸取歐陸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神髓。說到底，美國總以實證主義為基調，即使英國文化研究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後陸續滲透到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它還是被吸納到自由多元光譜中的一點，始終是一支偏流，只能從弱勢的邊緣抗衡實證主義的支配霸權。

實證主義旨在把複雜的宇宙化約為最精簡的元素，並建立當中的因果關係。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成果輝煌，有目共睹。但社會科學要是「完全」模仿

自然科學，接受實證主義，最大問題是人間事除了客觀規律，還有一層一層的意義必須主觀闡釋。實證主義追求理論的普遍性（generality），甚至把普遍性擴張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universality），不惜抹煞歷史的特殊性為「例外」，殊不知社會科學的「例外」有時比「常態」更有弦外之音。實證主義者也不太理會本體論和知識論，往往把看問題、看世界的「方法論」（methodology）簡化窄化成為研究技術（methods），以為這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或最後的標準。他們從頭起就凍結第一層次的根本問題，逕向美國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本假設靠攏，並以這些假設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在建制（establishment）的範圍內只顧回答一些技術的問題。他們躲在「科學」的門牆下，關起宏大學術思潮的活水源頭，當然碰不出什麼辯論的火花。他們在既定的範圍內向內看，埋頭經營，山頭愈分愈支離破碎，連有意義的對話溝通都不可能。美國傳媒研究更是抽象層次低、理論薄、關懷窄，即使在實證主義的架構裡恐怕也位階不高。

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 1963）早年曾用involution一字，概述當年爪哇島土地肥沃，使得人口愈來愈膨漲，幸虧農業社會人多好辦事，個人需求也不高，只要多排些筷子大家都有飯吃，但這樣不斷安插過剩的勞動力不啻火中取粟，愈耕耘愈沒有生產力，最後良田變廢墟。這個景象正是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的寫照。蘇鑰機（So, 1988）曾分析傳播主要學術期刊所引述的文章，發現以前引用很多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如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文獻，後來轉變到以徵引傳播文獻為主。我認為，「自給自足」未必象徵傳播研究的成熟，反而是involution的過程。傳播學門逐漸制度化（開設更多博士班，出版更多期刊）以後，自然而然會產生莫名的壓力、誘惑和錯覺，必建立不假外求的系統而後已，結果題目炒得太細，走火入魔的那些簡直如紀爾茲所形容的「技術化細分髮絲」（technical hair-splitting），表面熱鬧非凡，但再怎麼精確計算頭髮的分法，也彰顯不出整個頭的輪廓。

甚麼是美國的「主流」傳播研究？每個人繪的圖像多少不同，我無意言過其實，卻難免顧此失彼。我心儀的美國傳媒學者遍布各學科，基本上他們必須能見其大，又能見其小，宏觀和微觀並舉，經常縱橫幾個山頭領域；其中有實證的，有非實證的，有反實證的；有自由派的，也有激進派的。我鍾意明尼蘇達大學退休同事提奇諾（Phillip Tichenor）和他的合作者，他們用尋常的調查方法和內容分析探討媒介產生的「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不斷呼喚著社會公平。凱茲（Elihu Katz）涉及面更廣，舉凡媒介效果、「媒介事件」（media event）和有關文化帝國主

義的辯論，均另闢蹊徑。薛德森（Michael Schudson）結合社會學細緻地分疏新聞史，無不斐然可觀。我佩服當年老師社會學家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解讀權力和媒介話語。塔克曼（Gaye Tuchman）從現象學以濃筆描述媒介如何建構新聞，吉特林（Todd Gitlin）從「霸權」理論分析媒介對社會運動的建構，甘斯（Herbert J. Gans）以人類學方式研究記者、新聞機構和通俗文化，凱瑞（James Carey）從實踐主義堅持傳媒的民主角色，俱屬經典之作，其他的無法一一枚舉。這些學者多半是社會學出身，如果新聞傳播科系閉關自守，只讀「行內」書不旁騖，則必導致知識蓄水池的枯竭。可惜上面提到的這些學界領袖，採取國際視野的少之又少。我涉獵大量英國學者的著作，以便告別「唯美（國）主義」，也借助它們接通歐陸的重要思潮。

英國社會學家季登斯（Giddens, 1996: 4）說，美國學界過份「專業化」，只問耕耘自己的田畝，不管外面廣大天地的氣候變化，目光愈變愈窄，關懷愈變愈技術化，因此社會理論的重心已經從美國渡海轉移到歐洲去。過去二、三十年來，英國學者吸收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結構學派和義大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又融合本土的激進思想，形成統稱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傳統，與美式媒介研究一方面分庭抗禮，一方面互相滲透。有趣的是法蘭克福學派大師們俱屬文化精英，集中火力批評通俗文化和文化工業摧殘精緻文化的品味；英國文化研究大師多出身寒微，他們追求文化霸權的解放，並認為通俗文化和媒介是文化霸權的重要製造者。

文化霸權的「壓迫點」大抵包括階級、性別、種族。但文化研究這麼激進富生命力，都只看到階級，不及於性別或種族。先驅大師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出身威爾斯的鐵路工人家庭，學術旨趣聚焦於英國階級和「內部殖民」的壓迫，但他向薩以德（Edward Said）坦承「帝國主義」從未進入他的學術意識範圍，這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另一位大師侯爾（Stuart Hall），牙買加的黑人移民，一輩子環繞英國的階級問題轉，近年才回頭認真反省種族、膚色的文化意義。可是，到頭來，女權主義者統統怪罪這兩位大師忽略性別的壓迫。最後，我不得不再指出兩點：其一，英國文化研究仍以歐洲為本位，並不是那麼「國際化」，不能簡單移植到別的文化土壤；其二，文化研究脫胎於「文學批評」的傳統，有時未免令人覺得「文學」太少，「批評」太多，文化批評也不應該限於意識形態的批評。總之，我們勤收「西學」，取精用宏，但切忌囫圇吞棗。這是一項艱難、漫長但又不可逃避的功課，

只能靠整個學術社群長期努力。

五、華人的傳播學術視野在哪裡？

這個世界需要更多元的文化視野，華人學術圈哪天能夠了解美、英、法、德思潮的精髓，又能共同提出原創的問題、方法和理論，哪天就可以建立主體性，脫離學術殖民地的境地，而站在平等的立場與強勢的學術傳統對話。「華人傳播視野」不過是一個籠統的簡稱，尚待仔細分疏甚至解構：

（一）華人傳播視野建立於「共同民族文化」的基本假設上面。甚麼是文化？我個人比較傾向於接受文化研究者的立場：文化是一般俗民過往生活（lived）的經驗以及他們日常活生生（living）奮鬥的過程，而不光是陳列或塵封在歷史博物館的文物，更不僅止於供奉於廟堂之高的一部部典籍。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籠統的「華人視野」，將來也不會有。中、港、台的生活經驗和傳播視野勢必多元、複雜而矛盾。我不喜歡把東西解構到絕對或虛無的地步，毋寧相信文化有穩定性，有共同性。但這個共同性不能抹煞特殊性，這個穩定性是經歷動態變化的過程，不是靜止不變的狀態。用佛家語，就是展現「無常」之「常」，我們捕捉的正是「常」與「無常」的辯證性。

（二）民族性不能定於一尊，不能壓抑民族內部次級團體的各種觀點，更堅拒以任何政權功利的霸道立場為準繩。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面臨殊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內部條件的互動差別很大，即連三地傳媒研究的路向也是有同有異，頂多求同存異，休叫霸權的文化遮蓋地平線。學術的原創力未必和地理面積的大小成正比。大陸內部的發展失衡，漢民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陸的矛盾顯豁，廣州看到的中國和青海看到的中國是兩樣的。北京向「一國」的傾斜，正如香港對「兩制」的維護，這在媒介論述看得很清楚。

（三）在某些問題上面，「華人」的傳播視野未必是問題的第一性，階級、性別和種族的觀點也許才是主要的矛盾。上海新貴的時尚向紐約或巴黎看齊，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翻一翻《上海壹周》那些花花綠綠的名錶、LV皮包、化妝品、內衣和紅酒廣告也過足癮，社會心理學家說這是「替代式參與」歐洲小資的消費幻象。他們跟遼寧的失業工人、安徽的農民有多少靈犀默契？但碰到若干議題（例如民族主義），這些階級群體可能短暫會合，可見立場的分合因脈絡和條件而定。目前中港台的媒介都依市場邏輯運作，盡量討好有錢和有閒階級，而忘記了弱勢團體

在掙扎。

如何建立華人的傳播視野？我支持實證精神，但反對實證主義；正如我服膺科學，但反對科學主義。現階段且莫在先驗上決定好壞，不要畫地自限，寧可抱著開放的心靈，百家爭鳴，不怕嘗試錯誤，而要爭取在摸索中總結經驗，庶幾經過長期實踐逐漸形成共識，琢磨出幾條切實可行的途徑。台灣社會科學學者嚴肅提倡「本土化」二十多年，如今已經建立了「主體性」的共識，但在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分歧仍大（參考朱雲漢，2002；石之瑜，2002）。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明白「不要」走甚麼方向，還沒有確定「要」走甚麼方向。現有許多學者在嘗試各自的道路，假以時日，有的會從實踐中自然而然匯流在一道，有的則繼續堅持向自己認為對的指標邁進，這樣合力造就一個更豐富更成熟的學術環境。這是一條漫長的過程，快不來，急不得，但只要「主體性」的原則登上議程，就不會不分青紅皂白跟隨「西方」的流行之風了。

台港傳播學術圈已初步討論這個問題，可惜交集點不夠集中。在種種論述之中，祝建華（2001）的提議最值得注意。他主張先從本土實情出發，再從國際學術界「嚴格選擇直接相關而又能夠操作化的概念、命題或框架」，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整合性的中距離理論。同為實證主義者，祝建華的高明處在於先從本土出發，不像往常一般人拿所謂的「國際」理論來套取「本土」經驗。「國際」理論為「體」、本土經驗為「用」的迷信不破，主體性的建立無期。到此，我們面臨另外一個問題：操作化必須經過「化約」（reduction）的過程，不是所有重要的問題都可以（或應該）操作化，就算要操作化，其程度也因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取向而有粗細；人類學家、精神心理學家或文學批評家在剖析、解釋層次分明的「意義」時，未必可以（或必要）嚴格的「操作化」。他們畢竟以追求意義為第一性，規律頂多是第二性。我充分明白而且同情祝建華的選擇，他也有傲人的成績。但追求「意義」的學科正逐漸影響媒介研究的方法，卻不可等閒視之。

在方法論上面，管見以為：華人傳播學術圈除了熟悉實證主義，在現階段不妨多多探討韋伯式（Weberian）的卓識。韋伯（Max Weber）當然不是唯一值得效法的，但韋伯式的方法出入於實證論和現象學之間，從社會演員的意義世界入手，然後由研究者居間引進理論和概念，以便在歷史中照明一層層社會演員的意義結構，幫助他們闡釋生活的世界，這個方法可以兩頭兼顧實證的因果（抽絲剝繭，執簡馭繁）和現象學的意義（多元、複雜甚至矛盾，殊堪玩味）。換言之，實證主義假設

宇宙、社會只有單一的、可知的外在客觀規律，研究者的任務在於發掘這個客觀規律，這是第一性，文化特殊性只是普遍性的特殊「條件」或「狀況」，是異於常態的例外。現象學先注意不同群體建構不同的意義系統，然後研究者進場接通理論和這些意義系統的聯繫，但研究者只是第二性，是助緣，不能取代社會演員的主要角色。

容我不嫌詞費，再次強調：現象學以「社會演員」為主，以外在理論為客，求取文化特殊性和理論普遍性的平衡，它可以救濟實證主義的偏枯，更應該跟它爭鳴個長短；而且它所建構的不是單一的現實，而是「多元現實」(multiple realities)，其實有利於我們爭取主體性，有了主體性再尋求如何和西方學術平等對話。讓我打個不盡恰當的比喻談主體性：中國歷史上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來理解、吸收佛教，終至於儒釋道融合發展成爲一家，互相豐富滲透，但從來不是視儒家和道家爲客體去附會佛教，馴至替佛教充當補充的注解。換言之，儘管在交流的過程總有會合點，但原則上、順序上應當以西經注我們，不是以我們注西經。

在實際作法上，有人提倡整理古籍，只是實踐至今多半落得「牽強附會」四個字。閱讀古籍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但這還不是最大的挑戰——如果是，我們可以結合多學科逆水行舟，截長補短。在我看來，有兩個癥結更棘手：其一，如果只看文本，強作解人，用現代的名詞附會古代的語脈，以致脫離整個時代背景和生活語境，終歸是非歷史的，片面的。其二，如果把communication看作廣義的「溝通」，定義可能大而無當，用中國古籍勉強附會未必獲得同情而深刻的了解；但如果把它解作狹義的「媒介」(media)，則近代中國報業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始自西方引進，中國古籍對於探索媒介和中國現代性的啓示多大？我不敢妄言此路不通，但如何整理古籍是需要好好辯論的。（當然，我們不妨擺脫古籍的束縛，走入華人社會的日常生活經驗，從中尋覓深層的規律和變化，梳理並提煉系統的理論概念，然後與西方學術互相參照發明，得到廣義「溝通」的理解。社會學界〔如黃光國、金耀基〕對於人情和面子的現代闡釋，是頗具深意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最實事求是的，莫過於平時深入了解「西方」（這個名詞尚待解讀）的主要社會理論、學科理論（例如社會學理論，有別於社會理論）的脈絡，熟悉它們的重大辯論，以儲蓄學術理論資源。當我們面臨思考具體的問題時，則不妨先跳進去參照自己生存的場域，從中提出最有意義的問題，接著反芻平時留心的理論，一方面分析，一方面綜合，從小見大，知微見著。上焉者，如薩以

德，提出了另類（alternative）和針鋒相對、分庭抗禮（oppositional）的解釋、理論和視野。中焉者更清楚燭照文化的特殊意義，並聯繫理論的規律。主流理論通過了嚴格考驗仍巍巍屹立，起碼證明它雖是文化霸權卻不足為畏。說來說去，最根本的在掌握文化脈絡裡的內在理路，然後援引外在理論，刺激我們思考問題，幫助我們解釋證據和意義。老實說，深入認識自己已經很難，透徹理解主要西方理論絕不容易，難上加難，欲踏出長途學術跋涉的這一程，需要有膽識、有訓練、有熱情，切忌浮誇。

我最怕聽到一些浮誇的講法。甚麼要以「中華中心」取代「西方中心」，這是夜行人吹口哨自我壯膽。為什麼當真不得？其一，凡稱得上理論的東西必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誰可以一手包辦壟斷的。其二，社會科學是外來的，不是固有傳統文史哲的遺產，無論言語、敘述、思考方式，我們只能虛心學習，方期有所進境，才能把人家的學術系統「內在化」，變成自己的財富，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其三，唯有具備國際視野和比較眼光，才能知己知彼，成其大，成其遠，而不至於故步自封，自欺欺人。其四，我們的學術傳統不穩固，不能傲然獨立，干擾太多，社群太小，學術紀律和業績太薄弱，只配在學術殖民地裡關起門來自鳴得意，遠遠不足以創造一個有文化特色的視野。其五，「中華」和「西方」的簡單二分容或有分析上的需要，但最後還是要彼此滲透，互相學習；反對西方學術霸權，不是為了建立另外一個霸權（先別說建立霸權得有實力，我從不相信西方霸權這麼容易打倒），而是追求一個具有文化特色而又有普遍意義的視野，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爭取平等對話的權利，從爭鳴中促進彼此的了解。

六、中國傳媒研究的隊伍逐漸成形

美國學術界對於當代中國媒介的研究，最活躍而斐然有成的，恐怕不在傳播領域內，而在政治學。傳統美國傳播學像駝鳥，一味自我中心，凡是落在美國邊界以外的制度統稱為「國際傳播」，欠缺世界體系的視野，許多著作看不出理論的關懷。而中國傳媒研究只侷促在國際傳播的一個小角落。同時，美國對中國媒介的關心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政策的層面，政治學家把中國媒介（黨國喉舌）作為瞭解政治鬥爭和外交政策的窗口。這個觀點沒錯，只是窄了些。這十多年來，傳播研究受到多元學派的挑戰，新一代的學者輩出，對中國媒介的瞭解已經逐漸成熟了。

八〇年代以前出版的著作姑不置論。回顧八〇年代初，英國人霍金斯

(Howkins, 1982) 自詡寫成第一本根據實地訪問大陸媒介主管和記者的書。當時，我寫過一篇書評，援《紐約時報》把書分成「小說」(fiction) 和「非小說」(non-fiction) 之例，稱之為「非書」(non-book)。作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隔閡實在到了驚人的地步。當時，剛從文革牛棚放出來的驚弓之鳥，面對疑狐的外國問探，除了開留聲機重複官方濫調，不知還能說些甚麼？中國政治鬥爭慘烈無情，只有官方揭發政敵的黑材料最可觀；倘若當時讀 1979 年驚心動魄的《人民日報》，左手批四人幫，右手批「凡是派」，保證比霍金斯寫得出更有勁的著作。八〇年代末，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韓裔教授張元鎬 (Chang, 1989)，乘為中國記者培訓之便，由學員搜集官方資料，編撰《中國的大眾媒介》一書，了無批判精神，更未聯繫中國的政經變化與矛盾，讀來索然無味。這兩本書所寫的如果是美國媒介，絕無問世之日。

中國傳媒研究不再賣野人頭了。但美國社會科學各領域對當代中國的建構，無論議題、旨趣或是資源，一向由美國的學術要角一錘定音。華裔學者好不容易開始在發言台上贏得小小的一席之地，頂多與有榮焉當個資淺夥伴 (junior partner)。儘管無法撼動原有的霸權，華裔學者對自己所最關心的問題不再缺席，不再沉默，更不必唯西方觀點為觀點了。他們一時得不到主流學界應有的重視，但這是沒有辦法也不必太計較的事。他們正在培養一個有形無形的學術社區，遵守一般的學術紀律，大家用「文化中國」的角度，既分頭而又共同提出一群有意義的問題。這樣經過二、三十年的學術薰陶，努力不懈，可望逐漸形成一派獨特而深邃的學風。

我這篇文章反覆提到對話和交流，何嘗不是反映弱勢者的焦慮？我們急，人家不急。只有我們建立高標準的學術社群，拿得出漂亮的東西，人家才不能漠視我們的聲音，我們才能在全球化的脈絡找定位。華裔學者來自文化中國的各地區，又在西方學府接受嚴謹學術傳統的洗禮，各欠了兩邊深厚的知識債。他們必須拒絕義和團式的坐井觀天，夜郎自大。朋輩之間許多卓然有成者（例如趙月枝、潘忠黨、何舟、陳韜文、祝建華、馬傑偉），都初步帶來可喜的信息，證明中國傳媒研究和學術潮流接得上軌，可以為有意義的對話鋪路。學術的內緣因素為主，「國際」肯定與否還在其次。人家喝采不喝采，既非操之在我，便毋須耿耿於懷。

七、入乎霸權，出乎霸權

十八、十九世紀是英法帝國主義的世紀，二十世紀美國取而代之稱霸天下。在冷戰期間，「美國社會科學」（如現代化理論）除了擴張為「社會科學」，又於正統

學術之外設置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像螺絲釘般被編納於冷戰知識工業的體系內，為現實利益和政策需要服務，成為域外的野狐禪。區域研究者酷似學術情報員，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範圍內甚麼都懂一點，理論興趣在其次，以至於被專業學科認為不登「大雅之堂」。冷戰期間各區域行情的冷熱，宛如寒暑表的上下，凡是美國安全和利益之所繫，那個地方便突然行情看漲。七〇年代間，中美兩國輾轉為關係正常化探溫，中國學的經費不至於捉襟見肘，及至中國神秘的面紗揭開，中國學的地位急轉直下，從顯學頓入冷門。捱到冷戰結束，區域研究的存廢居然成了問題，學界爭辯是否該讓它回歸主流學科的建制。冷不防爆發九一一恐怖屠殺事件，美國忙著進兵直搗窩藏恐怖組織頭子的阿富汗。儘管山姆大叔曾積極介入阿富汗對抗蘇聯的侵略，這時卻猛然發現沒有幾個專家能對這個神秘落後的山國說出個所以然。反恐救了區域研究一命，一時廢不了。

美國本身的社會科學其實也是「區域研究」，只是這個詞意已經給綁架了，特指從美國的眼光看第三世界所得的知識。冷戰結束，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更獨霸全球，但它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霸權卻一直受到歐洲的挑戰，也逐漸為許多第三世界學者所抵制。華人傳播社群欲向霸權爭取發言權，必先擺脫區域研究的窠臼，踏入以區域為基地的研究 (area-based studies)¹。老實說，挖掘華人社區的材料，不是為了取悅西方國家的知識工業。我們應該汲取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和研究方法，接通區域的經驗意義，對話溝通。唯有不亢不卑，對具體的經驗現象提出原創的解釋，既照顧理論的普遍性，又充分豁顯文化的特殊性，在各層次展現同中有異和異中有同，最後才能向支配的結構爭鳴。這是從本土出發，超越本土，進而與「世界」接軌最切實的一條道路。

薩以德對「東方主義」的學術業績最具啟發的意義。他的觀點深受到早期傅柯 (Michel Foucault) 和威廉斯的影響：傅柯認為論述 (discourses，或譯為話語) 本來就是社會的建構，背後有權力的關係在主導；威廉斯 (Williams, 1977) 闡揚葛蘭西 (A. 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 理論，強調文化分析必須著眼於主流、另類和敵對意識在日常實踐當中互相「爭霸」(becoming hegemonic) 的動態過程，也就是看主流意識如何吸納、削弱、聯合非主流的意識，以及非主流意識如何抗拒、顛覆主流意識。秉此，薩以德 (Said, 1978, 1981) 先分析英、法、美帝國主義者在兩三個世紀間對中東建構了各種符合它們利益、想像和偏見的論述，再從根批判它們為列強服務的「東方主義」的文化霸權。在另一本書中，薩以德 (Said, 1993) 的

視野從西方列強在中東建立的文化霸權，延伸到第三世界抗拒、顛覆西方列強的霸權。他的著作逼所謂的學術主流回應戰帖，更爲「後殖民」理論開啓新河。

由此可見兩點：一、薩以德的成就代表庫恩（Kuhn, 1970）所闡述的典範（paradigm）變化：當正統的學術典範（假設、概念、定律）碰到相悖的零星證據時，往往歸之於「例外」；但如果「例外」出現愈來愈多，不能隨意抹煞，這時窮則變，變則通，有原創性的學者修正幾個根本假設，從此改變大家對世界的看法，嶄新的典範於焉誕生，成爲「新正統」，影響所及遍佈整個學術社群。二、薩以德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大家，畢生從未教過所謂的區域（中東）研究，但他從文學跨越縱橫許多領域，自由自在，不拘一格。他向來反對那些「向內看」的專業學者坐井觀天。

八、餘論

一位教哲學的朋友說我屬於脈絡學派（contextualist），我想了一想，欣然接受。我常覺得社會理論很少有絕對的是非，通常是角度變化，觀點自然不同。在一個脈絡之「是」，可能是另外一個脈絡之「非」；在同一個特殊的脈絡裡，甚至可能亦是亦非，端看條件、時間、議題而定。爲了減少一些可能的誤會，容我喋喋不休，再補充幾句話：我不贊成絕對化，只有基本教義派才會無限上綱，結果就是看問題僵化、教條而失準。我相信「是非無實相」，所以要把問題「適當」相對化，但不是漫無邊際、「絕對」相對化。要之，我反對絕對化，也反對「絕對」相對化。假如世界上果真沒有甚麼深遠價值值得護衛，學術工作豈不成了不折不扣的犬儒虛無？即令「無常」還是有「常」的一面，而那個「常」在我看來就聯繫到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基本價值上面了。這些基本價值應該萬古長青，我們配合時間和空間的脈絡不斷給它們嶄新的解釋。所以我主張要「相對」的相對化，千萬別連根拋棄那些基本價值，別把基本價值虛無化。辯證地看問題，我們才不會陷入絕對化或「絕對」相對化的兩極陷阱。

我前前後後一直強調建立華人社會的主體性，又強調對話與溝通，完全沒有排外的意思，更反對閉關自守的保守心態。吸收「西學」，接受學科紀律和標準的檢驗，這些都是不待贅言的。然而，對話權和溝通權不是天賦的；如同民主，它們只能靠弱勢者不懈的爭取，不能靠強勢者的施捨或讓渡。鑒於西方長期佔領學術霸權，我們需要發揮文化的特殊性，去消解它們（也是我們）「西方就是世界」的世

界觀。我們爭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平衡，反對以西方壟斷的普遍性來壓抑甚至取代我們的特殊性。在世界的脈絡裡面，許多人視為必然（普遍性）的「西方」經驗，其實可能只代表歷史或地理的偶然（特殊性）。以「西方」本身而言，穆爾（Moore, 1967）指出英國、法國和德國走過的現代化道路截然不同，提利（Tilly, 1975）也說西歐在十八世紀建造民族國家的過程未必能「複製」於當代的第三世界。沒有普遍性不成為科學，但究竟甚麼是社會科學的普遍性絕非一成不變，值得我們常常停下來思考一番。自然科學只有規律的問題，社會科學卻牽涉規律和人文意義兩個問題，所以社會科學界需要而物理學界不需要強調華人的主體性。

歸根結柢，我們的視野應該既是華人的，也是世界的，我自己嘗試從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理論兩條路入手，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聯繫普遍理論與具體情境，隨時爭取對話和溝通的可能。這種對話「既回響著不同民族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現代人的詮釋和檢驗」（樂黛雲，2002: 25），而且也要用現代性語言在世界文化語境表述獨特的文化風格與價值。三個華人社會所編織的光譜，所提供的比較視野——中國大陸的媒介變化，台灣的媒介與民主轉型，香港的媒介與主權回歸——是彌足珍貴的，而在我的嘗試中，希望貫穿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命題。我贊成後現代主義戳穿一些虛妄浮誇的、教條的全稱（totalistic）命題，但倘若因此而把民主、自由、平等、解放這些宏大敘述都一併解構，則將不知置學術關懷於何地？（本文為作者預計出版著作《傳媒與中國的現代性》的導論）

註釋

- 1 這個名詞借自 Prewitt (2002: 8)。

參考書目

- 石之瑜 (2002)。〈從東方主義批判到社會主義本土化〉，《二十一世紀》，74: 74-84。
- 朱雲漢 (2002)。〈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深層問題〉，《二十一世紀》，74: 64-73。
- 祝建華 (2001)。〈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新聞學研究》，68: 1-22。

- 樂黛雲 (2002)。《跨文化之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Berger, P. (197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New York: Overlook.
- Carey, J.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Chang, W. H. (1989). *Mass media in China*.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1963). *Th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1996). *In defence of sociology*. London: Polity.
- Hardt, H.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Howkins, J. (1982).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Longman.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C. C. (Ed.) (1990). *Voice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B.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 Park, R. (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New York: Harper.
- Prewitt, K. (2002). The social science project: Then, now and next. *Items and Issu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3, 1-2: 1, 5-9.
- Rogers, E. M. (1962).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4th edition, 1995)
-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 Said, E. (1981). *Covering Islam*. New York: Pantheon.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 So, C. Y. K. (1988). Citation patterns of cor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An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36-255.
- Tilly, C. A.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 W. M. (1991).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center. *Daedalus*, 120 (2), 1-32.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論壇作者簡介

李金銓，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講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國際傳播、媒介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媒介與民主、媒介研究與社會理論等領域。曾發表六十多篇英文學術論文。近著包括：*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editor;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coauthor; *Power, Money,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ditor。目前正在完成新著《傳媒與中國的現代性》。

E-mail: enclee@cityu.edu.hk

Perspectives and Communication: On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Media Studies and the Mainstream Western Scholarship

Chin-Chuan Lee*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Chinese media studies should cease to model uncritically after mainstream U.S. practices, but instead should strive to develop unique theoretical visions from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visions that explain social regularitie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while revealing theoretical generality through cultural specificity--in order to enter into a productive dialogue with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an equal footing. To that end, the Chinese media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absorb the dominant literature, but emerge from it with culturally sensitive interpretation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or oppositional to the established stock of knowledge.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cation, mainstream western scholarship, U.S. media studies, dialogue, communication, hegemony, cross-cultural studies, area studies, Cultrual China, positivism, Max Weber

* Chin-Chuan Lee is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